

## 心灵的震撼

“1937年‘七七’事变后，日本帝国主义用飞机大炮占领河北等地，接着又向长江一带入侵。全国人民纷纷起来焦土抗战，然而日寇铁蹄仍节节逼近南京。与南京一江之隔的镇江，也成了日本轰炸的目标。我们全家不得不从镇江逃难到镇江乡下。”

笔者感到奇怪地问道：“噢，您不是浙江黄岩人吗？怎么……”

黄淮微微一笑说，“是的，我的祖籍是浙江黄岩，而且我也出生在那里。因为我父亲黄志超是保定第一期军校学生。毕业后，便在孙中山先生的国民革命军中任职。因此我的童年是在父亲军旅频繁调动中度过的。1931年我们迁移到镇江，似乎相对安定了几年。到了1937年，我刚读小学四年级，不得不辍学逃难到镇江乡下。那时，我才11岁，闲在家感到很孤独。总盼着在上海大厦大学附属高中读书的姐姐能早日回来。一方面我有个伴儿，另一方面，姐姐会常常讲些故事给我听，特别是抗日的故事，什么‘一二·九’事件啦，什么‘七七’事变啦，我每每听了这些故事，心灵上总产生很大的震动。一天，我姐姐真的从上海回来了。可惜回

来的姐姐面色苍白，说是生病了，我父母都十分着急，到处求医问药，然而我姐姐却不把治病放在心上，而对她在上海学校里的救亡组织，总是放心不下，还常常对我慨叹一些丧权辱国之事，那黄浦江上停满挂着洋人旗帜的轮船等情景，极大地启发了我的爱国之心。

有一天，姐姐带我到村头一个菱角塘边。我们立刻被那田园风光所吸引，简直像步入了另一个世界之中：那蓝蓝的天空；那幽幽的青山；那一塘池水被嫩绿的菱蔓覆盖着，如同绿色的地毯平展开来；更有荡着木盆的采菱人来往穿行在菱塘中，不断地采下红红的菱角，堆集在木盆里，……这一切是那么质朴，生机盎然；又是那么温柔，宁静。这情景，可是在战火纷飞的 1937 年难得的祥和氛围啊。这时，姐姐仿佛也来了兴致，脸上漾开了少有的微笑。她借来一只木盆拉着我上了“船”。于是我们俩用手划着水慢慢地荡进了一片绿色之中。不大一会儿，采下了许多红红嫩嫩的菱角。姐姐望着渐渐堆起来的嫩红剔透，如玛瑙般光洁美丽的嫩菱，她爱之如醉。捧在手中，久久审视。忽然，我姐姐怅然地长嘘道：“阿香，因生我时天正下雨，故乳名叫雨香），你看这青山绿水，有多美呀。我们国家又多么富饶呀！可是……”她陡然沉思不语了。不知为什么，我深受姐姐情绪的影响，也呆呆地望着那堆刚刚采集的菱角，想着姐姐刚刚说的话，想着想着，耳际传来一阵歌声。这歌声非常委婉，又带着一种凄凉：“……我的家，在东北松花江上，那里有森林煤矿，还有那……”原来是我姐姐在低声吟唱。我好像从来没听到过这么好听的歌。它和我过去所听

到的慷慨激昂，激发斗志的抗日歌曲不大一样。这支歌是那么凄楚苍凉，在哀怨的旋律中透出一种悲愤的呼唤，“……流浪，流浪……爹娘啊，爹娘啊”姐姐唱着唱着，流下了眼泪，我的心也随之抽紧了。我问姐姐这是什么歌。姐姐告诉我这是流亡歌曲《松花江上》。

哦，这支歌深深地打动了，那悲凉、茫然的音律直往我心底渗透着，使我领悟到：流亡的人多么可怜呀！只有抗日才能救国，才能不当亡国奴！

从那天起，我爱上了唱歌。我天天练嗓子，保养嗓子。当听说刚生下的还带着温热的鸡蛋，喝下去嗓子会更响亮。于是我便想方设法找新生鸡蛋喝。想不到一首抗日歌曲，使我与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笔者：“作为一名才思横溢的女音乐家，您用您的一生去追求这抽象的美——音乐，编织出丰富多姿的歌，走进千千万万人的心田。有人说中国之大，人口之众，无处不流传着您的歌，就是在地球的那半边，多少个旅居国外的游子，也对您的歌曲深深迷恋，可见这些歌曲的魅力。

听说您 12 岁便成了国民党的“囚犯”是真的吗？

## 十二岁的女“政治犯”

黄准点头应道：“是的，是的。”她沉思片刻，说：“提到这段历史，必须先说一下我的姐夫邵公文。他呀，可是我走向革命的引路人哪！”

邵公文也是苏州人（与我母亲同乡），1935年参加革命，一直在出版界工作。他的公开身份是生活书店的经营人。实际则利用书店传播进步文化。抗战后，又领导和组织进步青年进行抗日救亡运动。1936年曾组织被派到延安帮助建立书店。在这期间与我姐姐相识，并在抗战的激流中结为终身伴侣。婚后不久，大概是在1937年，邵公文随生活书店迁移武汉，开展敌后抗日活动。同年10月，邵公文来信，希望我们全家迁往武汉，在战乱时期也好有个照应。这时，我父亲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十分不满，而自己已是快五十岁的人了，在家族中他又是长子，上有老母，下有幼子，家庭负担极重，便决定辞官返乡回黄岩。但为了不影响女儿的前途，他只好让我母亲陪同姐姐和我前往武汉。临行前，他亲手交给我母亲叁仟元生活费（这在当时简直是个天文数字），又把他多年撰写的“军需工作经验”书稿交给我姐姐，嘱她转交给邵公文，通过生活书店出版。就

这样，我们告别了父亲，从此结束了随父亲辗转颠沛的军旅生活。没想到我们却就此又走上更加坎坷的旅途；更没想到我们与父亲的这一次分别竟是永别，他于 1945 年便与世长辞，我再也没有见到父亲那和蔼可亲的面容……

黄准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。说到这里，她眼睛里微微湿润，满含深情，虽然她与父亲相处的时间并不长。

见此情景，笔者急忙安慰地说：“生离死别对任何人都公平的。谁也无法改变，特别是在那战乱的年月里。”

黄准镇定一下说：“唉，是呀！还是谈我怎么成为政治犯吧。”

我们一行三人乘船到了武汉后，和姐夫总算团聚了，并在一间小屋里临时安了家。可是不久，生活书店为了促进全面抗战。广泛宣传抗日救国，书店领导决定在大后方几十个大中城市开设分店。邵公文已是生活书店的骨干，他和姐姐自愿报名，去地处西南、交通极不方便、经济极其贫困，急需进步文化的贵州省贵阳市开设分店。这样一来，我们刚刚建立的新家又面临搬迁。由于对贵阳的情况不熟，姐夫、姐姐他俩先走，把我和母亲暂托在重庆生活书店工作的朋友李文同志处。于是我与母亲在书店同志的照顾下到了重庆，在重庆我们和李文大哥及书店的其他同人都住在生活书店的后楼。我这个 10 岁前就曾躲在蚊帐里读《红楼梦》的小书迷可是‘近水楼台’了。我一本接一本地读书什么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、《普通一兵》、《青年近卫军》等书都使我着迷。书看多了，无形中使我这仅小学四年级文化程度的孩子。在文学上得到很大提高。书中的主人

公自然也成了我所崇拜的偶像，成为我人生的坐标。连他们的口头语我也加以仿照。如《第四十一个》女主人公开口闭口“他妈妈的”我也学会了，动不动就他妈妈的。

“当时的重庆，因为山高路远，日本人无法入侵，所以大家都称其为大后方。许多不愿当亡国奴的爱国人士，都聚集在这里从事救亡工作，书店也经常开展一些文化活动。记得我还曾跟着书店的大哥哥、大姐姐们去看过赵丹和叶露茜演的话剧《塞上风云》，在舞台上叶露茜饰演的金花儿一角，身穿蒙袍，手执羊鞭，那个帅样，真使我神往。这次，我还有幸参观了他们的后台。后来又在一次集会上见到了赵丹，他那讲话时慷慨激昂的神情，使我钦佩无比。这些活动无形中使我对戏剧艺术产生了好感。我想，这对我日后走上艺术舞台不无关系。

在 1938 年 4 月，抗战进入高潮。主战派和主降派双方斗争得异常激烈。重庆、武汉更显紧张。姐姐和姐夫远在贵阳，实在放心不下，便又托生活书店的朋友将我们送往贵阳。每想起我们从重庆乘汽车到贵阳的情景，头就发晕。当时交通不发达，一辆破旧的长途汽车，在那坑坑洼洼、又窄又弯曲的山路上颠簸着，不大功夫，车上的旅客就开始呕吐了，我也被折腾得连胆汁都吐出来了。我躺在妈妈的怀里，苦苦地捱了四五天，才到了贵阳。然而贵阳也不是我想象中的世外桃源。俗称贵阳是“天无三日晴，地无三尺平，人无三分银”的地方，极其贫困。也许因为偏远之故，又被称为大后方的后方，不少名人志士为求其安下平静的书桌，便纷纷来到这里办学。我们刚到贵阳，人地两生，正巧

姐姐在苏州求学时一位启蒙老师叫顾诗灵，他在离贵阳 70 余里的湄潭中学任教，姐姐便决定送我去湄潭中学求学。于是我这小学四年级的小学生，一跃而为中学一年级的学生，这使我不胜欣喜。

临行前，姐姐交给我一只小布包，里面除了放几件换洗衣服外，主要是书本和学习用具。姐姐给我雇了一乘西南地区独有的交通工具——滑竿，我坐在滑竿上，开始了第一次独立生活的旅程。

现在想起来，那时我还真有点胆量咧。一个刚满 12 岁的小姑娘，独自一人，跟着素不相识的人，说走就走了。我坐在滑竿上，从一大早就上了山，直到太阳落山，始终蹒跚在崎岖、偏僻、难见人烟的山路上。特别是处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里，万一路遇不测，该怎么办呢！人道是‘初生牛犊不怕虎’，那时我什么杂念都没有，一点也不觉得害怕。反而随着滑竿上下颤动，从容自得地憧憬着未来。我想我将是一名中学生了，可以像姐姐一样，在中学里参加救国运动；像《青年近卫军》中的女学生一样，为保卫祖国而冲锋陷阵……一个一个璀璨的光环，在我眼前环绕。

我是湄潭中学唯一的一名寄宿生。当时时局动乱，学校经常不能正常上课，同时因湄潭离贵阳较远，国民党的反动势力鞭长莫及，更重要的是学校领导中进步力量比较强大，所以经常组织学生走出课堂，到街头、到农村宣传，“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”的道理。学校里成立了抗日民族救亡先锋队（简称“民先”），我首批参加了这个学生组织，积极地投入到学校组织的一切活动中去。因我会说国语（普

通话)，能讲一些抗日救国的道理；嗓子又好，会唱歌会演戏。在演《放下你的鞭子》中的小姑娘后，成了全校最为活跃的积极分子。

然而我的独立生活能力却差得可怜，那时条件非常艰苦，用水不便，连喝水都困难，就更别提洗用了，结果身上长了虱子还不知道。但当时并不感到苦。完完全全地被抗日的浪潮裹挟着，一天到晚忙得很，就连放暑假回贵阳时，也不愿放过宣传的大好时机。自告奋勇加入到步行的行列中，以便一路上边走边向山民宣传抗日。70多里的路程走了两三天。

回到贵阳，我和母亲仍然住在生活书店楼上，我又成为书店里的常“客”，并认识了书店中的几位同人，从而知道了贵阳书店中也有“民先”组织，他们的工作很紧张，是真正的“抗日民族救亡先锋队”，比我们学校的“民先”更正规，活动得更多更广泛。而当他们得知我是学校里的“民先”队员时，就欣然同意我参加他们的一些活动。我高兴极了，每天跟着大哥哥大姐姐们一起进进出出，昂首挺胸十分神气。他们亲切地叫我“小妹”。可我年龄虽小，从不甘落后，他们开会，我主动为他们站岗放哨；他们上街宣传，我也与他们同去演讲，教唱救亡歌曲。我们每到一处，就被许多群众紧紧围住。我们的宣传，造成很大声势，这使国民党反动当局十分恐慌，他们害怕民众组织起来了，揭穿他们“假抗日，真投降”的丑恶面目，于是就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和镇压。

在1938年“8.13”那天，“民先”和“贵阳学联”联合行

动，准备组织一次纪念抗日战争一周年的大型宣传活动。会址在贵阳市的民教馆。这次行动在前几天我已有所闻，心中早就盼望着能参加了，但究竟是怎样活动，在哪里集合我是一无所知。原来他们在对我“保密”。到了“8.13”那天，一大清早我被楼下的人声惊醒，看见书店里的“民先”队员们已经出发了。我很生气，怪他们为什么不叫我呢。于是我急急忙忙穿好衣服，跑下楼去，跟着他们就跑。一直跑到郊外一个有块大牌坊的广场上，见他们已经在整队集合了，我急吼吼地找到“民先”的负责人张大哥，脸涨得通红地埋怨他不该丢下我。这时，他才不得不告诉我，因为这天的行动国民党可能会进行破坏，怕有危险，而我年纪太小，才决定不让我参加。这可把我急坏了！不让我参加，这怎么行呢？我已经盼望了好几天了，居然临到行动时，又不让我参加，急得我眼泪都要流出来了，我硬是缠着他们，非去不可。时间已经不早了，队伍马上就要出发，他们见拗不过我，只好同意。但条件是不能在队伍里面走，给我一个叫“交通员”的“美差”只限我在游行队伍外面前前后后传递消息。一旦有情况，便可随时混进群众中容易脱险。我高兴极啦！十分认真地一会儿跑前一会儿跑后，送条子，带口信，似乎比游行队伍的人们还要忙。

到了民教馆，队伍陆续进去了，我是进还是不进呢？也没人通知我。这时正好见到一位大姐正要往里走，我便紧跟着她，混了进去。一到里面，便感到一种阴森森，杀气腾腾的气氛笼罩着整个会场。原来国民党已经包围了民教馆，会场四周，站满了上好刺刀的宪兵队。这时一个当官的

正在训话。讲台桌上放着一摞印好的“悔过书”，他大叫大嚷地说什么“民先”是非法的组织，游行示威是扰乱治安，要“民先”队员在悔过书上签上名才能放出去。他的这番话，激怒了所有的青年们，大家起来争相反驳。有的干脆发表演讲；有的人愤怒地指责国民党种种不抗日的罪行。被激怒的人们，大声唱起了救亡歌曲。会场气氛越来越紧张了。我一直跟着这位大姐姐，跟着她喊口号，唱歌，一点也没害怕。可是，当时并不是人人都不害怕的，我见到也有一些人，当然是少数人，就在‘悔过书’上签了名后被放出去了。也有的家属，把孩子硬拖了出去的。这时天色已晚，坚持斗争到最后的人，便被全副武装的宪兵，一个一个地押上了汽车，我也在其中。

汽车把我们拉进了一个破旧的院子里，又把我们分别关进了一间间破旧的屋内，我和几个大姐姐同在一间屋里。我们都饿着肚子，身上直发冷，再看看屋里根本没有床，只有一些乱稻草堆放在地上。

这时我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。有点想妈妈，想姐姐，还想着其他许多大哥哥大姐姐，不知他们被关到哪里了？加上又饿又冷，真想哭，可又不好意思哭，只好坐在草堆上下意识地搓弄着稻草。忽然发现板墙上有条细缝，无意中把稻草捅进那条细墙缝，没想到稻草竟被隔壁的人接了过去。不一会听到隔壁传来轻轻的扣击声，接着传来说话声：“喂 你们是谁？我们是……”我一听高兴地跳了起来。原来隔壁也关着我们的人。我急忙把这消息告诉了大姐姐们，从此，这条细墙缝，成为我们互相传递信息的秘密通道。第

二天 国民党把我们全体押到院子里，说要受“军训”，强迫男的剃光头，女的要剪短发。大家坚决反对，硬是把他们的鬼花招给顶了回去。他们无可奈何地把我们重新关进破屋里，很快我们又从那条细墙缝接到通知，要我们全体队员坚定意志，决不屈服，以绝食来抗议。我们积极响应，绝食了好几天，肚子实在是饿得难受。可是一想国民党反动派不让我们抗日，不让我们爱国，气愤得连肚子饿也不在乎了。这时我们的反抗斗争得到了全贵阳市人民的支持，他们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，展开了积极的营救活动。一方面组织游行示威，抗议当局非法逮捕爱国青年，一方面对关押的青年进行慰问。我们收到了许多慰问信，赞扬我们坚持正义的斗争精神，鼓励我们坚持下去，必定胜利。还送来很多食物。在这强大的支持下，我们感到无比温暖，更加坚强了。

国民党迫于内外的压力，不得不给自己找个台阶下。对一般普通队员，只要有人担保，就可以释放，最后剩下的，都以所谓“骨干分子”和“顽固分子”被转移到贵阳监狱。

直到现在我还不明白为什么我这既不是骨干分子，又算不上顽固分子的小姑娘，会被当成‘政治犯’一同转进监狱去，我想：一种可能是我的姐姐和姐夫忙于更重要的组织营救工作，没来得及顾到自己的小妹妹；还有一种可能是我年纪虽小，但闹得挺厉害，不管什么原因，我和三四个大姐姐一同关进了牢房。

这牢房可是名副其实的监牢，黑黑的墙壁高耸着，没

有一扇窗，只有铁门上开了一个尺把见方带锁的小孔，供他们叫人和监视用。倒是有一排破烂得不像样子的木板床，床上什么也没有，只有臭虫。记得我往上一坐，就咬得我起了好几个红包块，又痒又痛，说不出的难受。我感到好伤心，便偎依在一直照顾我的那位大姐姐身旁。这时那位大姐姐好像看出我的心思，便领头唱起歌来。声音越唱越响亮，情绪随之越来越激烈。最后我们高唱《国际歌》时，大家纷纷流下激动的眼泪，任凭看守们如何叫喊“不许唱！”我们毫不理睬地唱着，以示抗议！

牢饭难吃，这次我算尝到了牢饭的滋味了。除了掺满砂子的米饭外，就给你一碗带盐的辣椒。我本来不会吃辣椒，开始我一口也吃不下，辣得眼泪往下流。大姐姐耐心地劝导我说“不吃饭哪里有力气坚持斗争呢。”接着她大口大口地吞食着，于是我也跟着她吃。从此，我学会了吃辣椒了。

后来，反动当局为了对我们进行分化瓦解，便一批一批地进行审讯。他们大概以为我年纪小，易于突破，便对我单独审讯。当看守把我带到传讯室时，一个胖胖的家伙坐在椅子上，桌子上放了些糖，还放了一张悔过书。一开始他假惺惺地说：“小妹妹，请吃糖吧。”我一看他那副讨厌的样子就来气，便狠狠地白了他一眼说：“我不吃！”接着他又摆出仁慈的样子说：“你想家吧？是啊，哪有孩子不想妈妈的。只要你在这悔过书上签个名，就可以回家见到你妈妈了！”我说：“我不签名，我也不要回家！”这一下把那肥家伙刺疼了，他瞪起两只猩红的眼，把桌子一拍说：“哼！你不

签名不悔过，我就杀你的头！”我一听，也火了，顶了一句：“我没有罪，凭什么杀我的头！”那肥家伙支吾了一阵子又说：“你们的罪状可多着哪，有十大条！你个小姑娘懂得什么，别跟着他们瞎胡闹！”我听出他这是在污蔑我们抗日活动，真把我给气坏了，便反驳道：“我们是爱国，怎么会瞎胡闹？！我们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，难道有罪吗？你们不让我们爱国，你们才是有罪呢！”那肥家伙无言以对，恼羞成怒，拍着桌子大吼道：“拉下去，拉下去！看我怎么整治你！”

我回到牢房里，把刚刚的情况告诉了大姐姐们，她们都夸我说得对。在她们的鼓励下，我更有信心了，同时，我觉得自己突然长大了许多。能够像大人一样，单独与敌人斗了。从此，我决心不论关我多久，绝不向敌人低头。于是，我跟其他人一样，天天唱那充满激情的救亡歌曲；我们还在破木板床上练跑步，锻炼身体；开讨论会；还向看守讲抗日的道理……

到后来，外边声援的呼声越来越高涨了。每天有成千上万的群众高呼着口号，在监狱门前过。这声音，温暖了我们的心，也吓破了敌人的胆，他们怕把事情闹大了，彻底暴露了他们“消极抗日，积极反共”的丑恶嘴脸，才不得不一批一批地放人出去。也许因为我顶撞了那个肥家伙，他真的要“整治”我，把我与大姐姐俩人，仍然留在狱中关押着。由于有大姐姐在，我心里踏实多了。并且相信“坚持到底，就是胜利！”

后来，经过地下党的营救，我也被保释出狱了。

当我妈妈来狱中领我时，那个曾审讯我的肥家伙，挺着个大肚子，气咻咻地对我妈妈喊道：“你回去要好好管教你女儿，这个小姑娘太凶了！”

我妈妈不动声色，一语双关地回了他一句说：“她还是孩子呀！”

与我同囚的那位大姐姐，一直没有被释放。我到了延安以后，才听说她被当做重要的政治犯，和另一位“民先”负责人凌大哥一起被国民党杀害了！啊！多少优秀的中华儿女，为捍卫祖国而献身！

笔者亦感慨万分地说：“是啊！先烈们前仆后继，用血肉之躯换来了新中国。然而他们连胜利都没有见到呀！对于我们，怎能忘记他们呢，……”

黄淮深情地说：“忘记过去，就等于背叛！没有那些革命的先驱者，我也不会走向革命，更不会有我的现在。”

笔者：“这是时代对你的塑造，才使你这仅有 12 岁的女孩，便有这般经历，这般富于传奇色彩，这般有胆识。而你颠沛流离的童年，无形中使你见多识广，过早地直面社会，感悟到人生的炎凉。这是一般人，特别是今天那些温饱于母亲怀抱里的儿童，所不能理解，所难以得到的成长环境。还有你的姐姐和姐夫……”

黄淮突然以不容置疑的口气激动地说：“还有我的妈妈，我的妈妈侯湘云……”

## 我的妈妈.....

我的母亲在这个世界上经历了三个朝代，经受了九十四年的风风雨雨。1890年的冬天，她出生在丝绸故乡——苏州市一个贫困家庭里。这个贫困家庭已经连生了两个女儿，对这第三个新生女婴实在无力养活。只好忍痛托接生婆将女婴抱给育婴堂，企求一条生路。多亏她的大姐，就是我的大姨妈追出门，在冰冷的巷子口，从接生婆手中夺回来，我的母亲这才有幸在家中生存下来。一家人苦挣苦熬，在她三岁时我外婆始得一子，一家人如福星临门，把新生男婴视若命根子，好像有了儿子，从此可以结束贫穷似的。然而，恶运并没有放过他们。在我母亲六岁时，三岁的弟弟便夭折于霍乱病中；七岁时，贫病交困的父亲离开了人世；十三岁时，她的母亲也因积劳成疾，又缺医少药，终于遗留下三个未成年的孤女和无力偿还的一堆债务，便辞世而去了。

在这接踵而来的无情打击下，她和两个姐姐走投无路，眼前一片漆黑。怎么办！姐妹三人总要活下去呀！于是她们从绝望中站起来，擦干了眼泪，再谋生路。我妈妈操起曾经向外婆学会的调丝手艺，日夜为人调丝。调丝的收入

极其微薄，自己已难糊口，何况负担一个家庭。于是她一边帮人调丝，一边学习牵花手艺。这牵花工艺原来是不准女人沾手的。但是为一家人活命，她勇敢地去破除那陈规陋习，硬着头皮，顶着身后的唾骂，顽强地学、学、学。终于感动了一位老牵花工。他对那心灵手巧、聪明能干的侯湘云（我妈妈的名字）十分赏识，破格地收她为徒。在老师傅的热心指教下，我妈妈仅用了七天的时间，学会了一般人需要三年才能学会的牵花手艺，成为当地的第一个女牵花手。

自从她登上了高高的织机后，便日夜苦干。冬天里，寒风穿透头顶上的薄瓦片，冻得她手脚麻木了也不敢停手；夏天里，烈日烘晒下，爬上织机，如同进了烤箱，不大一会儿，汗水浸透了衣衫。不管春夏秋冬，一天干上十几个小时，几年下来，她成了苏州远近闻名的织锦高手。她的工资由一天两角提高到四角多。她把所得的钱，自己分文不留，全数交给已经成家有了子女的两个姐姐，使两个姐姐有了贴补，生活有了改善。从而她的社会地位也随之改变了。她的实践，清楚地告诉了她“命运的改变，要自己去争取。”她又从两个姐姐的不幸婚姻中，懂得了一个道理：终身大事，一定要自己做主。所以，在她二十四岁时，经人介绍，自己做主，选择了驻防在苏州的我的父亲黄志超。婚后，他们互敬互爱，相濡以沫。

我妈妈争取了选择配偶权，但她无法选择公婆。我的祖母是一个极封建的妇女，自我祖父死后，祖母便成了这个大家庭的掌事人。祖母本来对这门“未经父母之命，自定

终身”的亲事，已是难以接受了。尽管儿媳生得端庄秀丽，十分贤慧，但她心里还是不能平衡，再加上我妈妈第一胎生的是个女孩，更是耿耿于怀。妈妈由于月子里没调养好，患了不育之症。父亲给她多处求医问药，也未生效，连着六七年未能生育。我祖母早就盼着早生子嗣，为黄家传宗接代，儿媳偏偏又患了不育之症，她可急坏了，于是她想方设法地让我父亲另娶新夫人，我父亲不从。祖母便连着拍了数次电报，催我父亲速归，我父亲都不愿回去。最后竟以“母病重速归”的电报，要把我父亲骗回去，这时我父亲不得已带着妈妈，姐姐和他们领养的一个男孩——黄敏一同回到了黄岩老家。当我父亲到家后，面对着要死要活的威逼，考虑到自己是长子，对祖业的继承，只好答应下来，没想到娶了新夫人的第二年，我妈妈又怀了二胎。生下来又是一个女孩，因此我的降生，并没给家中带来喜悦。反而惹得祖母更大的不满，扔下一句：“又是一个女娃子！”便气咻咻地走出门。

从此以后，我妈妈的日子更难熬了。祖母阴沉着脸，动不动便指桑骂槐。家庭气氛十分阴晦。记得我两岁多了，常常奶声奶气地连声叫她“阿嬢，阿嬢！”但从未换来她的一丝笑容，见到的只是阴沉的白眼。久而久之，我产生一种惧怕的心理，处处躲着祖母。就是大家围在桌边吃饭，我祖母的脸也是绷得紧紧的，叫人生畏，那里还敢有欢声笑语呢。餐桌上除了腌萝卜干，白水煮青菜外，倒是有一碗唯一的好菜——腌鱼。这碗腌鱼，祖母把它摆在餐桌中间，好像供品一样，谁也不敢伸出筷子挟上一块吃。大我八岁的姐